



新世纪

文学视野中的「三农」

彭青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世纪

文学视野中的「三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09XJA75100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文学视野中的“三农” / 彭青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161 - 0576 - 4

I. ①新… II. ①彭…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②农业经济 - 研究 - 中国 ③农村经济 - 研究 - 中国 ④农民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I206. 7 ②F32 ③D42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1901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40843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三农”文学概说	(1)
第一节 “三农”文学产生的背景及相关社会资料的研究	(2)
第二节 “三农”文学的概念界定	(10)
第三节 “三农”文学题材的当代解读	(14)
第四节 “三农”文学的美学品格	(16)
第二章 新世纪“三农”题材小说创作扫描	(27)
第一节 罗伟章：农民的路在何方	(31)
第二节 陈应松：血腥暴力的神农架	(45)
第三节 贾平凹：吼过“秦腔”难言“高兴”	(56)
第四节 迟子建：温情掩饰不住的悲怆	(73)
第五节 孙惠芬：歇马山庄和上塘村皆非归宿	(80)
第六节 周大新：南阳盆地里的湖光山色	(89)
第七节 马步升：黄土脊晃里的村庄隐忧	(95)
第八节 雪漠：大漠戈壁里的世态众相	(103)
第九节 胡学文：行走在草原坝上的“鱼”	(117)
第十节 尤凤伟：涸辙之“鲋”	(124)
第十一节 夏天敏：迷途的大羊	(130)
第三章 新世纪“三农”题材报告文学管窥	(141)
第一节 李昌平：说给总理的实话，揭开中国农村现状的 红盖头	(150)

第二节	何建明：“国家叙事”下的公民责任	(159)
第三节	冷梦：中国人的村庄，中国人的根	(165)
第四节	陈桂棣、春桃：揭开农村伤疤的“乡村医生”	(170)
第五节	梅洁：倾诉是一种声音，疗救才是行动	(176)
第六节	姬广武：没有硝烟烽火的世纪决战	(181)
第七节	李林樱：贫困的呐喊与呐喊的贫困	(185)
第八节	朱凌：灰尘尚未散尽，同志仍需努力	(189)
第九节	宗满德：我的零度叙事，你的多维界说	(195)
第十节	黄传会：偌大的城市怎样才能放稳一张我的课桌	(199)
第十一节	杨文学：农村的路是农民走出来的	(203)
第四章	“三农”文学的期待	(209)
第一节	“三农”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承担的任务	(209)
第二节	“三农”文学的期待	(211)
参考文献		(218)
后记		(220)

第一章

“三农”文学概说

新世纪以来，随着“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以“三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一大热点。2002年1月，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这是一部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2003年，陈桂棣、春桃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出版，2004年，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十月》、《上海文学》、《钟山》、《大家》、《山花》、《萌芽》等，纷纷推出了一批“三农”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新世纪十多年间，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些知名作家写出了数量众多的关于“三农”题材的文学作品，显示了中国作家对现实问题的深度关切。“这些作品大都描写了农民的生存状况、农民工的生存际遇、农村的法律现状以及农村基层政权的‘潜规则’等，多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文学题材中的农村领域”^①，并塑造了丰富多彩的系列农民形象，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崭新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农民工”系列形象是以前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不曾有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人物系列越来越丰富多彩，足以让读者领略到世纪之交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丰富与复杂多变。对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作家们表现出极大的写作热情，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关注他们进城后的遭遇、关注他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他们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可喜的创作现象，值得文学评论界关注和研究。

新世纪“三农”文学，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担当起现实主义历史使命，客观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的生活图景，形象地反

^① 周新民：《透视文学作品中的三农题材》，《中国文化报》2005年3月9日。

映了现实生活，它忠实于现实，毫不粉饰和回避客观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社会和历史的某些本质的东西，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作家们以亲身的感受为依据来评判事实，从文化思想的反省到对现实的审视，把艺术的美与艺术的社会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令人震惊的社会画卷和悲愤交加的质询语调，揭示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和农民群体的困顿、煎熬。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三农”题材文学创作与以往乡土题材、农村题材文学创作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它是在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差别巨大，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陷入困境的特定历史、特定语境下的文学创作现象，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城乡二元格局中农村落后于城市发展，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时代大趋势，中国农业面临困境的特殊时期产生的文学现象。“三农”文学热切关注中国农业的历史处境、深刻反思中国农村的贫弱原因、考问中国农民的现实出路，它承担了反映乡村现实、认识农民主体性、吁问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享发展成果、反思乡村历史和文化、提供独特的美学形态等任务。这是文学的良知和时代对“三农”题材文学内在的深层呼唤，这就要求作家必须直面“三农”，用文学的方式朴素而诚恳地反映现实。这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解决问题，是文学场中永恒的精神魅力。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文学有自己的立场和承担，那就是启示的承担和坚守人道的承担。作家们对乡土中国文明状态的审视与叩问，既传承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传统命题，又贯注了崭新的现实生活内容和深切的民族前途忧思。“三农”文学在新世纪以来，不单单是一种创作现象，而是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创作思潮，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这个创作行列中，成果蔚为大观。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从整体上探寻其创作特色与规律，发挥文学反映现实的功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第一节 “三农”文学产生的背景及 相关社会资料的研究

“三农”问题，是指探讨有关农村、农业与农民的问题。对我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来说，“三农”问题成了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头等大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点和重点都在“三农”。农村不和谐，社会就不和谐；农业不稳定，社会就不稳定；农民不小康，社会就不小康。“三农”问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全民小康的头号问题。“三农”问题在中国这个农业文明延续了数千年的国度里，是一个永久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永恒关注的对象。但是，明确以“三农”的形式并列而并重地提出来，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依据和支撑的：城乡改革初见成效；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推进；工业可以支援农业，城市可以反哺农村……只有经历这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才成为可能。“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中，最突出的依然是“三农”问题。“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不仅影响了广大农民生活的改善，而且越来越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大，影响到农村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可以说‘三农’问题是我们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①

“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2000年3月2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了《给朱镕基总理的信》，在信中他讲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实情，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央专案组立即到当地调查，将实际情况上报给中央。中国政府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引入政府工作报告，并随之迅速成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开篇提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到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改革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占人口比例60%

^① 朱智文、雷长兴：《西部开发中的“三农”问题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以上的农民，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其一，劳动报酬在 GDP 中比例太低，其首要原因是随着农民工替代城市职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低收入低福利大大压低了劳动者分享的 GDP 比例，再加上制度和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倾斜，从而显著增厚了企业与政府的分享比例。其二，城乡收入差距太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达三倍之多，而中国社科院估算则在五倍之多。其三，“农副产品价格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不断下降，而农村负担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实际还在增加，而且这种负担主要由农民承担。农民不但收入低，而且由于农村负担基本上是‘摊丁入亩’，他们种田越多，负担越重。”^① 与此相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30.3%，到 2008 年直线下降到仅 8.87%。这样就进一步把中国的贫富差距从市场化改革后城乡差别为基尼系数 0.3—0.35 拉大到 0.5 左右，即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除个别小国外最悬殊的国家。“中国今天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已经从二元经济结构变成三三制结构：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户籍人口，三分之一的纯农村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及其直系亲属漂浮在城镇与乡村之间。三分之一的人口处境尴尬，进退两难，是结构失衡和社会不安的根源。这三分之一的人口往哪里走，决定了中国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格局。而迄今为止农民工家庭的情况基本是，人往城里走，房在乡下建，父母分居，子女留守，老辈种田，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是民生福利的最大损失。”^②

温铁军认为：“政策界讨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开通城乡让农民进城，始于 1984 年‘大包干’完成、1985 年‘一号文件’准备出台之际。因为从 1982 年允许推进家庭承包制后，农民有了自己决定种植、养殖的权利，农产品生产中的经济作物开始增加，因此，1984 年至 1985 年前后，伴随着政策上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价格，农民自发进入城市销售鲜活农产品，比如蔬菜、瓜果、禽蛋、肉类等等，农民贩运、经商现象大量出现。在这种客观变化的作用下，1985 年‘一号文件’出台前的讨论已经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9 页。

^② 华生：《主要矛盾已改变，调整改革思维迫在眉睫》，《南方周末》2010 年 3 月 4 日，第 31 版。

明确提出‘开通城乡，打破二元结构’。而且，其实当时的讨论已经把问题的本质讲清楚了，即城乡二元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城乡的对立关系，是城市对农村的剥夺，或者说是所有城市市民对农民的一种剥夺。”^①

199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从2001年6月开始，课题组按概率方法，在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72个市、县、区进行6000份问卷调查，根据对结果的统计与实地调查，撰写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五大社会经济等级”，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个人、农民；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分为“十大社会阶层”，第一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他们拥有组织资源；第二阶层是经理人员阶层，他们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第三阶层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拥有经济资源；第四阶层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他们拥有文化资源；第五阶层是办事员阶层，他们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第六阶层是个体工商户阶层，他们拥有少量经济资源；第七阶层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他们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第八层是产业工人阶层，他们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第九阶层是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第十层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他们基本没有三种资源。^②在“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和“十大社会阶层”中，农民处于最底层，他们占有很少量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所以，他们的经济收入明显地偏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6年，农村居民平均年纯收入比上年增长9%，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3.4%，1999年增长2.2%，其增长是逐年缩小的。

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图”所示：

①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5页。

②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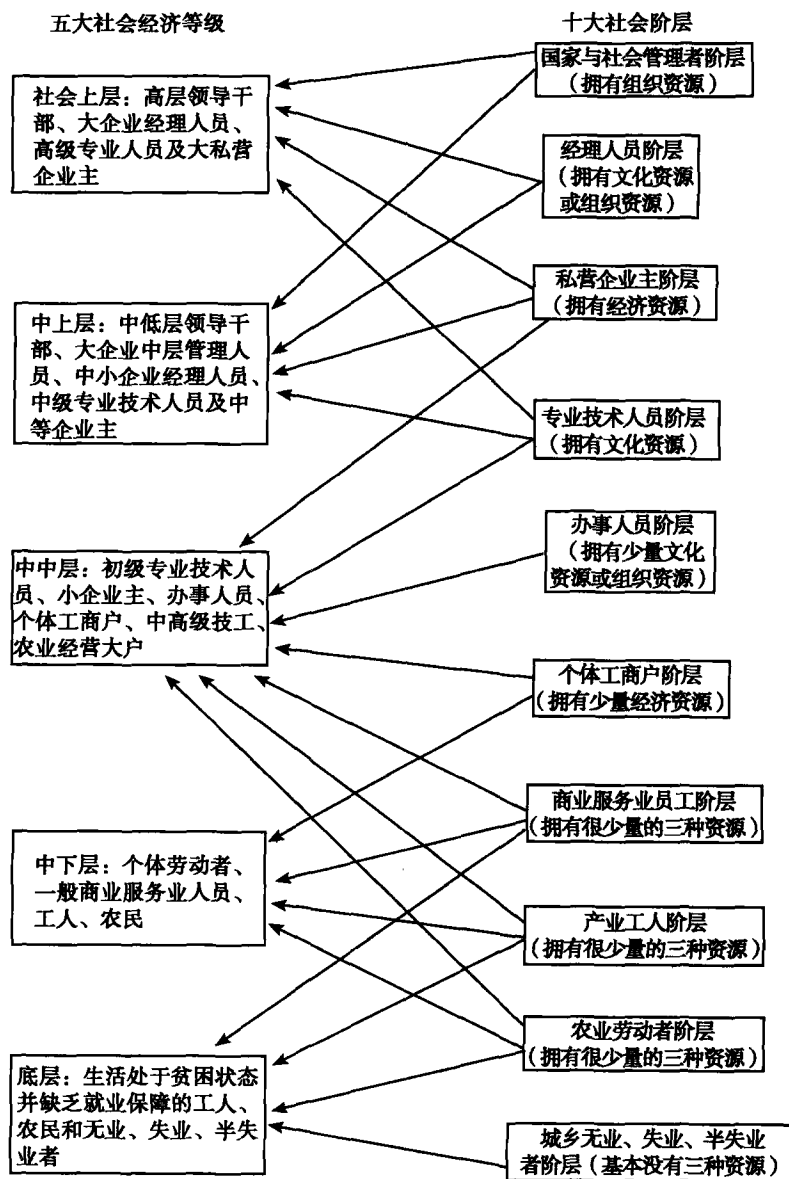


图1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图

注：图中箭头表示相关社会阶层的全部或部分可以归入五大社会等级中的某个等级。

图片来源：陆学艺：《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与其他各阶层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这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现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日益

严峻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向前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改革的步伐必须顾及“三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郑有贵将“三农”政策演变影响因素及其逻辑关系呈现为图，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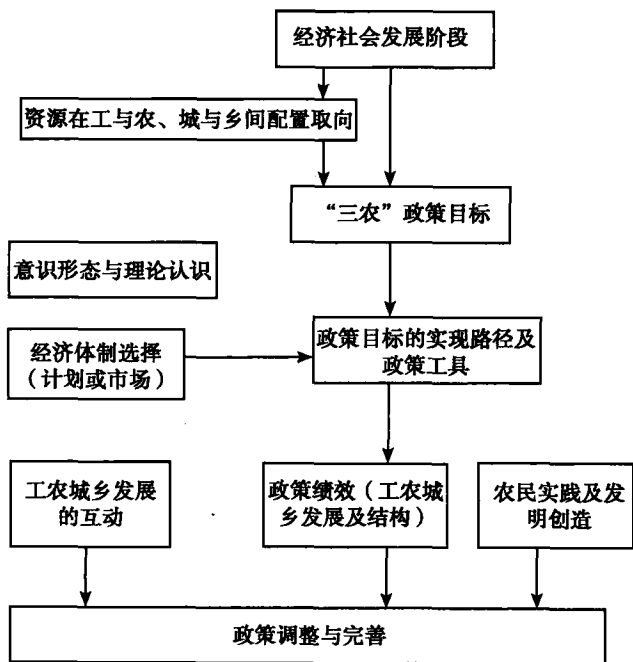


图2

图片来源：郑有贵：《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最终成果简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http://cpc.people.com.cn/GB/219457/219506/14633594.html>）。

图2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探索，主要是围绕“三农”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展开的，或者说“三农”政策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演变可以很好地体现中国共产党在“三农”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三农”文学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公正的失衡和社会阶层利益分配的不公；二是农村与农民受到文学的特殊关注，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其重要根源在于中国社会的变革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农民。没有农业的支持，就难以完

成工业化改造，而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这就是中国的社会革命、中国现代化与农村、农业互相依存的内在逻辑关系，也是“三农”文学创作何以兴盛的历史必然性。任何文学都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反映。“具体到文学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纯文学’就逐渐占据了文学界的主流，这一潮流的特征主要有：注重形式、技巧、叙述的探索与创新；回避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描绘，而注重表达个人抽象的情绪与感受；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及最新‘潮流’的模仿与学习。这一思潮对反拨此前文学的弊端具有历史性作用，对文学作品整体艺术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思潮发展到后来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其结果是形式探索只成为了一种貌似先锋的姿态，向西方学习也成了一种盲目的崇拜。2001年，李陀等人开始‘反思纯文学’，希望文学能够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重新建立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纯文学’的反思，是文学研究、理论界至今仍方兴未艾的话题，而‘底层叙事’的兴起，则是创作界反思‘纯文学’的具体表现，也是其合乎逻辑的展开。”^①作为“底层文学”主要组成部分的“三农”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学内部的需要下产生、发展并兴盛起来的。社会的原因与文学自身的原因，让“三农”文学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思潮。“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市场经济正改变着每一位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商品生产带来了统一价值观的破碎，带来了诗意生活的消散。在一个精神生活越来越粗俗化的时代，一个不尚思辨的时代，为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文学不惜媚俗与堕落。这些不仅消解了它的教育作用、审美作用，而且其传统意义上的功能也丧失殆尽。”^②随着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凸显，农民生存现状的艰辛，成为文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不仅表现为文学组织的有目的、有意图的倡导，同时还表现在作家自觉的创作当中。为了纪念赵树理诞辰一百周年、总结文学史经验、推动“三农”题材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山西省长治学院于2006年5月中旬在长治学院共同举办“赵树理与三农文学”学术研讨会，来

① 李云雷：《“底层叙事”前进的方向——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小说选刊》2007年第5期。

② 李群：《当下文学呼唤道义责任与良知》，《光明日报》2009年7月3日，第8版。

自全国各地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在会上,宁波大学戴光中指出,赵树理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三个方面的启迪,第一,文学应该高度关注“三农”问题;第二,真实地表现“三农”问题,不应回避新农村建设中的浮夸风、花架子与农村基层政权等问题;第三,与全社会一道探索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20世纪初,我国人道主义思潮与“劳工神圣”观念交相生辉,农村与农民问题得到文坛的关注。“三农”问题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三农”题材的广度与深度也成为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并有所超越的重要标志。从鲁迅、叶圣陶、茅盾到张天翼、沈从文、赵树理,从柳青、周立波、浩然到高晓声、古华、张炜等,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或乡土文学的传统一直继续不断。到21世纪初,正在变化和发展中的中国农村,再次成了整个社会关注的新热点。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先锋叙事到城市欲望化的叙事之后,文学创作陷入狭小的个人空间,玩弄技巧的写作离社会现实越来越远,文学震撼人心的力量逐渐式微。而一些作家,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叙写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状态,反映他们的疾苦与心灵世界,给波澜不惊的文坛吹来了一股强劲的春风。孙慧芬2000年推出长篇小说《歇马山庄》,雪漠在2001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大漠祭》,与此同时,报告文学创作中也不断有作品推出。深入农村、聚焦农业、关注农民成了中国作家的主要行动,从而引发了文坛“乡土叙述”的高潮。但是,新世纪的“乡土叙述”与以往的乡土叙述有所不同,它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启蒙立场,更多的是作家对农业的担忧,对农民的同情,对农村经济衰退的现实反映。在城乡二元格局中处于劣势的农村与城市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农民生活进一步陷入困顿之中。农民在土地上不能得到生存的保障,看不到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他们被冠以“农民工”这样一个尴尬的称号,他们在城市干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报酬与他们的付出不相称。除了这些,他们在人格、尊严上受到侵犯。一些作家凭借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敏感,以文学的方式展示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引发全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密切关注。2006年1月,中国作协主管的《小说选刊》改版,把一张民工坐在路边啃馒头的照片放到了封面上,同时重点推荐罗伟章的《我们的路》。新世纪以来,在

长篇小说领域对农民工生活有了集中的关注和反映，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实一直都在当代作家的视野里，所有这些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文学的道义使然。从罗伟章《我们的路》到陈应松《马嘶岭血案》、荆永鸣《北京候鸟》、尤凤伟《泥鳅》、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贾平凹《高兴》等，这些“农民工问题文学”所反映的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三农问题”、“城乡差别”。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比较高的起点，成为新世纪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

第二节 “三农”文学的概念界定

新世纪以来，“三农”题材文学创作是特定时代、特定语境及特定话语机制下的文学创作，也是文学题材的新的领域。它与以往“乡土题材”、“农村题材”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是关于当代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题材，具有新的历史内涵与时代特征，主题文本呈现出复杂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文本具有新的规范和特点。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也可以径直称为“新世纪文学”。^①由张未民的此论断，我们也可以将本研究的内容径直命名为“新世纪‘三农’文学”，它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巨大的城乡差别，农民所受到的种种苦难与不公平的待遇，作家对这些问题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成为一种新世纪特有的创作现象与潮流。在新世纪文学的范畴内，我们要研究的内容是有关农业、农民、农村题材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具体是指2000年以来出版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是自中国“三农”问题出现后，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我们将体现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命名为“三农”文学。文学是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抚慰与引领，是为了让人获得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作家是真理的追求者，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叩问者，是现存价值的怀疑者、批判者。新世纪以来，以陈应松、罗伟章等为代表的作家，用他们的良知、追求与创作实力，创作了《马嘶岭血案》、《我们的路》等反映“三农”问题的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继他们之后，许多知名作家也将

^① 张未民：《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进程》，《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

创作的内容调整到“三农”题材上来。《中国作家》自1996年发表中篇小说《大雪无乡》、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三门峡移民始末》、诗歌《想起老家》起,每年发表“三农”题材的各类文学作品数量不断递增;2003年《当代》刊发了陈桂棣、春桃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收获》、《中国作家》、《十月》等,推出了一批“三农”题材的文学作品,显示了中国作家对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一批活跃在当今文坛的作家,用他们的良知和道义,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对中国“三农”问题用文学的方式进行了反映,他们的创作对特定时代的特定农村现象进行了文学的再现。这种创作不是几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的创作,而是中国当代作家群体化的创作。这个创作群体不仅人数众多,而且遍布全国,影响深远。小说方面,有贾平凹、迟子建、关仁山、孙惠芬、陈应松、夏天敏、刘震云、赵光明、荆永鸣、罗伟章、尤风伟、王祥夫、周大新、胡学文、马步升、葛水平、雪漠、李洱、残雪、郝树声、潘灵、张继等。报告文学方面,有李昌平、陈桂棣、春桃、何建明、朱凌、魏荣汉、董江爱、梅洁、海默、宁小龄、黄传会、李青松、杨守松、乔迈、李超贵、卢跃刚、姬广武、宗满德、李林樱、冷梦等。他们的创作体裁、创作风格及其数量众多的作品,构成了中国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现象。

我们将对这种创作现象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分小说与报告文学两大类,按照作家分节进行专门的研究与介绍,所关注的作家作品是在当今中国文学期刊或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作品,所选取研究的作家是中国文坛比较有影响的文人作家。这些作家分布在全国各地,既代表某个地域的“三农”文学创作成就,也可以代表21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绩。我们将当前文坛引起反响的有关“三农”问题的作品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梳理,对其艺术风格进行概括与总结,探讨其审美价值与不足之处。采用的是欧美新批评派文本细读的方法,对这些作品在细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评判。在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命名现象比较频繁,比如有一个概念——“底层文学”,它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现象,或者说思潮。我们要研究的“三农”文学既属于新世纪文学,也属于底层文学,是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一个作家,并不轻易地打上“三农”作家的标签,如果这样,就窄化了作家的创作。比如,贾平凹的创作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只选取他新世纪以来的两部长篇小说《秦腔》、《高兴》进行研

究，在此之前的贾平凹的其他小说不在本研究范畴之列，例如《浮躁》等。以此类推，迟子建、孙慧芬、罗伟章、陈应松、雪漠、马步升等作家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在“三农”问题这个概念没有产生之前，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作家自觉地深入农村，创作出了相当数量的农村题材作品。这些作品绝大多数走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画廊，塑造出了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比如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划归“农村题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学经历了由宏大叙事到个人欲望不断张扬的过程，一些著名作家写作的重心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出现了大量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的《废都》等。

“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成就最大的就是乡土文学或后来被称为农村题材的小说。这当然是两个不同的文学概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农村题材’的命名。这个范畴被称为乡土文学，它是那个时代最成熟的文学。这当然与中国乡村的前现代社会状况有关，与作家的乡土记忆和经验有关。虽然那个时代的作家都离开了乡土进入城市，但他们并没有整合出普遍性的甚至个人性的城市文化经验。即便是都市化程度已经很高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或者感受到城市的文化经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农村题材发生于延安时代。面对风雨飘摇的中国，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整个民族的全员动员，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乡土文学’对前现代中国用文人式的脉脉温情或田园牧歌式的顾盼流连，那混沌或暧昧的书写，是不利于民族全员动员的。于是，杨白劳和黄世仁两个阶级的对立被建构起来。被动员起来的杨白劳们终于翻身做主人。‘农村题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一直到《艳阳天》、《金光大道》，农村题材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一直是70年代以前文学的主流观念。”^①到了新世纪，中国作家把写作重心渐渐转移到对“三农”、“底层”的关注，尤其是“三农”问题成为作家创作的热点。仅2004年上半年，《收获》、《花城》、《当代》、《十月》、《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钟山》、《大家》、《山花》、《萌芽》等十种杂志刊登的小说中，

^① 孟繁华：《乡愁：剪不断，理还乱》，《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2期。